

# 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本期栏目主持人:钱超英

主持人语:人类到处都在生活。在过去三数十年间,澳大利亚社会几与我国同步,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改革开放”,尽管背景和性质不同,但其共同后果是大幅度地增进了两国的政经联系。如果说,中澳关系是我国走向世界进程的一个缩影,那么它对澳大利亚来说则是文化变革的指标之一。同时,这种变革还关乎澳大利亚对自身国家身份的探索和全球定位的调整。迄今为止,国人对这个南半球最重要的西方国家的研究并不足够。这种不足,不仅可能妨碍人们从两国的共同经验中获益更多,而且也不利于对国际文化复杂性的全面认知。套用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艾力克斯·米勒的话:“边界是为了有人跨越而存在的”,澳大利亚提示我们,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有关“西方”的故事和有关“国家”的叙事。在全球文明发展的风景线上,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需要更多样化的参照系。

本期两篇有关澳大利亚的文章,一篇以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动态建构为主轴,从国际关系格局和内部文化生态等维度,力求为认识澳大利亚勾勒一个较大的时空轮廓;另一篇则从澳大利亚文学活动的具体记述和统计中,捕捉了当代澳大利亚与中国、亚洲文化界发生联系的微观踪迹,一份新鲜的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取材切近,观感翔实。无论是追求远眺之阔大,还是把握近观之精微,我们认为,对世界文明许多“次要领域”或“非主流对象”的预设,可能仅仅是片面、盲视和怠惰的后果。深入开发这些方面的研究,或许比热炒几个诸如后殖民、后现代、后工业、全球化的概念,更有助益于世界文明的比较和对话。

## 澳大利亚:移民、多元文化与身份困惑

钱超英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疑难,体现为其在现代国际地缘政治不同定义之间经历的六阶段演变,以及在移民、土著和多元文化主义三大问题上所从事的政治文化实践。澳大利亚对国家身份的探索受制于历史、现实的国内外情势与文化理想的复合作用,其模糊和不确定性同时提供了其在世界格局中特有的适应性,并为理解当代“多种后殖民处境,多重身份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和学理上的启示:需要以灵活动态、弱化极性和“越界”的思维透视世界文化格局。

**关键词:**澳大利亚;移民;多元文化;身份困惑

**中图分类号:** G 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09)02-0005-08

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政治的重构》写道:“(20世纪)90年代爆发

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

收稿日期 2009-02-12

作者简介:钱超英(1958—),男,广东广州人,深圳大学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跟我们不是一伙’??”<sup>[1](P129-130)</sup>亨廷顿认为这不仅适用于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民族国家(如从前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人民)而且也属于“更一般的国家”。例如,对澳大利亚,该书就发表了这样触目的评说:“澳大利亚是试图背弃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期,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廷——埃文斯<sup>①</sup>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sup>[1]</sup>”(P165)。澳大利亚这个仅仅两千余万人口的南半球国家,之所以会让这位深谋远虑的美国政治文化策士如此大费周章,首先是因为澳大利亚对于今日世界具有特殊意义。而这种意义又是由其独特的国家身份问题所构筑的。

## 一、“太平洋国家”还是“亚洲国家”

在全球版图上,澳大利亚作为孤立而完整的巨大陆岛偏处于南半球,尽管它(和新西兰一并)是距西方世界核心地区最远的地理单元,但却是扼守南半球海洋世界的最大、最稳定统一而又最具有战略纵深的政治地理实体。1770年英国殖民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1786至88年间,英国政府正式开始对其统治和移民,在其东南沿海设立罪犯流放地,这成为澳大利亚大陆“文明”历史的开端。而原已在澳大利亚生息了数万年之久的土著民族则遭到白人的大量屠戮和驱逐,正是在土著的血泪和殖骨之上,英国人逐步把这个流放场兴建成了新国家。早先有多个殖民区分布于澳境的东南部、西部和北部沿岸地区,如同北美殖民地开始时的情形,各据一方自治经营,1900年英国议会通过《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次年,1901年1月1日,各殖民区改为州,各州正式组成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延续至今。

从全球视野看,这个新国家的孕育过程不过是西方早在15世纪就开启的全球地理探险、殖民扩张历史中的新一页:与澳大利亚几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外缘——新兴地区,包括北美和南非,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开化”过程。例如,随着地理地质勘探活动的开拓、对大量矿产的需求和采掘手段的发展,这些地区相继发现了贵金属矿藏,特别是金矿,吸引了更多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前往采集,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以这些地区为目标的越洋淘金潮。而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公路、铁路、城市和大片土地的开发也急需大量劳动力,也是第三世界海外

契约劳工得以进入的原因。这些都促成了涌向北美、澳大利亚的短期或长期移民的浪潮,成为资本主义新兴国家早期发展的人口移动、汇聚景观。

进入20世纪,澳大利亚不仅幸免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且可从战时、战后经济贸易中获益良多,故其社会经济发展很快。澳大利亚的发展不仅与作为西方“飞地”的一系列新兴国家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同构性,而且也使它成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极。然而,澳大利亚却又始终有着其他西方社会所不多见的国家身份焦虑,因而被亨廷顿归入“无所适从”的国家之列。

这种国家身份上的严重的不确定,首先明显地表现在:它对于自身的世界地缘特点所可能赋予的意义和作用难以定义,具体地说,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西方文化根源的现代国家,在处理与亚洲国家及其文化关系时始终面对深刻的矛盾。其在区内的国际交往和政治角色的反复演变呈现为一条相当曲折的历史线索。这一线索大致可划分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其立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英国属土”为自足意义,对亚洲采取排斥、防范和自闭的态度。自18世纪后期英国人正式殖民澳大利亚直至成立联邦国家的120多年间,尤其是19世纪中叶发现金矿的时期,各个自治殖民区都通过了限制华人和其他亚洲人入境的法例。这些法例成为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宪政基础的重要部分。正是出于协调各区关防、限制华人和亚洲人利用各殖民区之间的管理漏洞迂回进入澳境的需要,这个新生的政治联合体才迅即实行了一项“白澳政策”,旨在把澳大利亚打造成纯种白人为主的社会。这一歧视性政策一旦奠定,竟执行了接近70年。这为这个新国家打上了一个与生俱来的暗淡烙印。

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时,其特征是初步发展了与亚洲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改变了外交政策基本以英国为轴心并多依赖英国代行的被动状况。1909年,即联邦成立近十年时,澳国接受了当时清政府派出的总领事并与其签订了护照协议。一战结束之后,迟至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赋予澳大利亚自主处理内政外交的全权(自此澳大利亚作为英国臣属仅具形式,英女王只在名义上为澳国元首)。1934年,澳国派外长访问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和几个亚洲国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酿成,英国在德国法西斯攻击下自顾不暇,迫使澳大利亚开展较为积极的区内交往,1940年9月

它相继向美、日、中派驻了外交代表,1941 年在华建立了公使馆。1942 年元旦,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发表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新年贺词,宣称澳大利亚将与亚太国家积极发展团结互助的关系。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员,澳大利亚的北部领土曾受到南侵的日本战机的轰炸。战争危机促使澳大利亚认识到:它除了与亚洲邻国协同战斗,共担安危命运和国际责任以外别无选择,这为澳大利亚社会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界,也孕育了新的区内认同。

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其特征是追随美国“抵抗共产主义”,成为西方对东方冷战中的亚洲“斗士”角色。澳大利亚在二战中出现的国际关系的良性转折,因冷战格局的形成而转向变调:从战前的“英国臣属”、战时的亚洲盟友,突变成战后的美国仆从,快速滑入美国全球战略的轨道,而与亚洲多个国家的发展再度脱节和严重抵牾。1949 新中国成立时,澳国采取了拒不承认的立场;次年(1950)朝鲜战争爆发,澳大利亚视之为“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入侵、扩张”的证明,把新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它是美国之后第一个应“联合国”要求派兵朝鲜的西方国家。再次年(1951)的 9 月,它和新西兰与美国联合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三年后(1954)的 9 月,再与美、英、法、新西兰等联合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两大条约帮助美国构建了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弧形军事同盟体系。紧接而来的 1955 年,澳大利亚就派兵镇压了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暴动,初显其国际准宪兵的角色;1965 年,又以“遏制北越共产主义渗透”为名参与了美国主导的侵越战争。这样,整个 50 至 60 年代,澳大利亚的区内活动便基本上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所左右。

第四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亚洲政策大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崛起,其巨大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并不为过。此前,1958 年它取消了“白澳政策”一项核心内容“语言听力测试”,即不再用严格的英语标准来阻挠、限制亚洲移民,到 1968 年甚至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然而最显著的变化还是要等到 1972 年工党政府上台之时。这一年,惠特拉姆领导的新政府对国家政策大转向作了这样的宣布:“澳大利亚将成为对亚洲事务不作军事干涉和反对任何种族歧视之国”。这一讲话清晰显示了澳大利亚国内和国际政策之间的关联。在这一年里,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随后也与北朝鲜、越南等国建交,并从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撤回了军队。1973 年,它颁布名为《非歧视

性移民政策》的新移民法,表明其移民事务“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和国籍歧视”,一举洗脱了这个国家和南非并列作为制度化种族歧视国家的恶名。尽管惠特拉姆政府在执政 3 年后(1975 年)即被弗雷泽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所取代,但已经开始的革命性转变仍然获得了延续。这种转变的部分契机,固然是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在西方激起的连锁反应,但澳大利亚的“过度抢进”也显示了其意欲重新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的迹象。1977 年,澳大利亚政策的调整甚至促使《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签署 23 年之后被迫终止(这或许应被视为亨廷顿所谓“背弃西方”的较早一步);1988 年,在澳大利亚国庆 200 周年的同一年,中国政府总理李鹏作为非西方联盟的亚洲大国领导人首访澳大利亚。1989 年初,澳国总理霍克在汉城首倡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同年 11 月即在澳国首都堪培拉主持召开了 APEC 首次部长级会议,澳大利亚由此成了 APEC 机制的策源地;1989 年 12 月,澳大利亚外长伊文思第一次使用了“全面融入东南亚”的提法,1990 年 7 月,这位伊文思再次提出一个仿效“欧安会”模式创设“亚洲安全合作会议”的倡议;1991 年 12 月,新任总理的保罗·基廷更进一步提出了“澳大利亚的未来在亚洲”的战略思想,发展了一套“融入亚洲”的国内国际政策陈述,包括在国内民众中发动脱离英国的共和运动。1992 年,保罗·基廷提议召开亚太首脑会议;1994 年再次提出把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并为一的设想;这一时期,随着澳国申办 2000 悉尼奥运会的成功,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宽容共存的文化特色和社会愿景进一步为亚洲和世界所认识。这也是澳大利亚随亚洲经济起飞而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它的对外贸易份额从侧重于欧洲转变为以亚洲为重。

顺便一提,正是这一阶段的发展引发了本文开头引述的亨廷顿对澳大利亚忧心忡忡的评说。针对这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摆动所体现的国家身份问题,亨廷顿还提议澳大利亚应转而与美国建立更深的同盟关系,把自己“确定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他认为,澳大利亚像美国一样具有英国本源,也是欧洲人占绝对多数的移民国家,价值观相近,因此不应竭力挤入一个“文化上相异的(亚洲)集团”。亨廷顿提议“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扩大成北美—南太平洋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便“协调文化和经济,并为澳大利亚提供一个坚定而持久的认同。”<sup>[1](P165-166)</sup>事实上,在下一

阶段,人们看到,亨廷顿的这一提议对澳大利亚并非没有产生实际影响。

第五阶段,从1996—2007年,随着“后冷战”形势的发展,澳大利亚的角色再次出现明显转变。在约翰·霍华德政府的操作下,它的国内国际政策逐渐向“右”突击。约翰·霍华德本人在上台前就提出过“一个国家”理论(意即反对澳大利亚被不同来源的文化分裂为“多个国家”),上台后即与保守民间兴起的反移民、反多元文化的“汉森主义”默契互动。1997年,澳国发表了一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通过扩展定义其安全战略利益区,从传统的东南亚、南太平洋扩至东亚、美国和南亚地区,显示了与美国“安全”概念交叉重合的态势;1999年,霍华德借出兵东帝汶维和之机,提出了所谓“霍华德主义”的“交叉理论”(即干涉主义)。2000年,澳军再次出兵平息斐济和所罗门政变;同年12月,发表新的国防白皮书,这一文件在2003年又以此进行重要修订,根本改变了70年代惠特拉姆以来的非(军事)干涉政策,宣称对“邻近国家以远”的危机也有权采取军事行动——事实上,它既是对已在东帝汶、斐济、所罗门等地实施的军事行动合法性的“追认”,也是为其后来在2001年和2003年以反恐名义参与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提供的政策依据。2003年12月,澳大利亚还宣布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澳大利亚的这一系列动作,大有重返当年作为美国仆从阶段的态势。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霍华德主义”操控下的“倒退国家”在一个政治经济面貌急速改变的亚洲和世界面前举步为艰。目前,澳大利亚正处在国家定位的第六个阶段,态势再次扭转。2007年,由凯文·拉德(汉名陆克文)领导的工党在大选中全面胜利。新政府甫一上台就通过加入《京都议定书》、撤军伊拉克和促使构建中的美、日、澳、印同盟机制缓行等举措,来拉开与美国国际政策的距离。当然,人们必须看到,如同上一阶段霍华德时期一方面跟进美国战略,另一方面也竭力维持和亚洲日益增多的联系(霍华德向其西方伙伴解释说,这种发展着的联系是“实用主义”的)一样,新生的陆克文政府虽然显示了回归区内信任的决心,也未必意味着最终要与“美国优先”的对外关系主轴脱钩。明显的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倚重于亚洲,国防战略维系于美国,长期来看它将运用其文化身份的多元、模糊不定所形成的弹性,左右逢源地充当区内和世界多种力量的协调人,以此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尽管这种选择并非没有代价和风险——尤其是对于其自立于世界强大国

家的政治文化雄心而言。目前的澳大利亚似乎尽量在“亚洲国家”和“太平洋国家”之间谋取一个平衡、兼容的“亚太”国家身份。历史的回顾显示,这种国家身份的探索 and 实验仍未有穷期。

## 二、“白澳”国家还是移民国家

上述对澳大利亚的考察有几个要点:(1)澳大利亚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变化始终是比较激烈、明显的,政策摆动幅度之大,确为其他西方国家所少见;(2)这种变化和其国内因素有着深度的牵连(通过选民影响的政府更替和政策调整来体现);(3)虽然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自立国以来一直稳定至今(除二战时期外,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发生剧烈振荡),但与其自身存在意义相关的文化身份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这是一种有别于领土的、物质的“意义”问题,但绝不因此而缺少其严重性。以亚洲崛起为诱因,这一问题导致90年代兴起的一场“文化战争”(恰好和本文开头所引亨廷顿描绘的全球“认同混乱”同一时期,而且也成为其标志之一)。这种“文化战争”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帮助人们理解与澳大利亚在世界格局中的立场变动和反复选择有关的内部情势。当然这种情势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其中包含三大问题:土著问题、移民问题和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因篇幅关系,下面重点以头两个问题作考察。

### 第一是土著问题。

澳大利亚的“文化战争”涉及到对世居土著民族的处置,乃因它与世界上其他新兴西方国家(日本除外)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噩梦:土著居民早在欧洲白人“发现”诸新大陆之前即已先行存在,并在白人移民国家建立后遭受巨大苦难。相较于北美,由于澳大利亚没有大规模贩卖黑奴的过程,因此也没有北美那样尖锐的“黑白”矛盾,但肤色灰黑、浅棕的土著人口仍成为历史和现实中严峻的社会难题。白人立国之前,土著已在澳大利亚大陆生活数万年,白人抵达时的土著人口约有五六十万,伴随着白人逐渐占领大陆所有最宜居地区,数以十万计的土著被屠杀,剩余的数万土著居民大部分被驱逐到条件艰苦的中部沙漠保留地。在“白澳政策”之下,白人政府的一个“善行”是从这些土著家庭中强行收去大批婴儿,转交给白人家庭管养,以利“同化”。这不仅令土著再增家庭离散之苦,而且造成今日土著中有大量找不到原生父母的后裔,被称为“被盗去的一代”。土著及其文化的急速衰亡不仅在澳大利亚所宣称的文

明价值体系中裂开了一个刺眼的伤口,成为国家的耻辱,而且也有碍于来自西方的白人在完成殖民后转而扮演“属于当地传统的守护者”<sup>[2]</sup>这一角色。在国际国内压力下,尤其是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白澳政策”被废除之后,土著在人口养育、就业、教育、政治参与和文化保存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改善。然而与此同时,权利意识的觉醒也使土著的索偿诉求冲击着现代澳大利亚社会,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马宝法案”。土著岛民艾迪·马宝及其同胞在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一项诉讼,要求索回他们在澳北部马尔岛的土地拥有权,其理由是世代早居于此,先于白人殖民者的“发现”和占领。该案的审理延绵 10 余年,中经多级法院“驳回—上诉”的循环周折,直到马宝本人 1992 年逝世后近半年才在联邦高等法院胜诉。终审判决认为,假如土著能够证明其与某一块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应具有地权,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占全澳境 12% 的土地,而且必须是公地,而非已确立了私人业权的土地。这一历史性的判决成就了土著争取恢复原住民权利的一大胜利,尽管它也给其他援引这一案例争取同样权利的土著人民设下了限制。这些限制不仅体现了这个白人移民国家作为既成事实的制度基础(完全推翻这一基础则使现实社会崩溃),而且还体现了西方法理与土著文化的冲突;要举证自己和一块土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有现代法律认可的证据,而大多数土著有的只是传统的神话、传说、歌谣中饱含伤感的祖先家史,何况这些材料也因土著生活流徙和环境激变而面目全非,难于复原,只有沦为“文化记忆”的价值。这种“文化记忆”既断裂于西方白人的殖民史诗,也很难在西式法律的意义生效。土著坚持把现代澳大利亚的国庆节称为“入侵纪念日”。土著权利的完整恢复事实上是一条困难重重的无尽之路,这成为对于国家统治结构合法性的历史文化根源的一个长久质疑。2008 年,凯文·拉德领导的新政府在胜选后的数月,首次发布了其前任霍华德政府一直不愿表达的对土著的郑重道歉,这是澳国土著关系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尽管它并不足以冰释这一历史疑难,但也充分显示土著问题对澳大利亚国家文化身份的重要性。

## 第二是移民问题。

作为本来就是由移民建立的国家,现代澳大利亚的移民问题是今日国家生态的一部分,这不仅是指澳大利亚需要通过不断补充外来移民以维持、推动社会经济和技术的提升。移民政策通常成为各政

党和社会团体的日常议题,而且,移民问题也维系着澳大利亚对自己国家身份的动态建构。它其实仍和上述土著问题有隐秘的意义关联(很少研究者指出这一点)。对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移民立国的新兴西方国家)来说,持续地接受外来移民,适足淡化、缓解对早期白人占领历史的批判压力,而强化作为移民“共享”国家的意涵,把统治的既成事实变成一个长期的国家特性展现过程,以修补西方文明华美约言的伦理漏洞(这样,统治阶层不仅在面对土著时看起来是保护“本土”传统文化的守护神,而且也是面向外来文化并以之不断“丰富”既有文化结构的进步天使),这可以使当年西方白人殖民的黑暗往迹被编织进一个由不同的移民参与其中的、不断“丰富”、“进步”的时间序列之中,国家身份也就在移民动态中获得某种合法化、合理化的意义资源,有关“移民国家”的持续叙事于是成为其“澳大利亚性”的正当性基础。笔者认为,这应是深度观察西方有关国家移民神话的一个重要视点。

然而,澳大利亚移民事业的发展和上述的意义探索过程是相当曲折的,充满了文化的困扰和利益的冲突。其中,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经历又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指标。

尽管有历史学家相信,华人是本地土著以外最早进入澳大利亚大陆的人种,但有文献确切记载的华人入境始于 1848 年,即中英鸦片战争后的第 8 年,该年中国的第一批“契约劳工”被用轮船运抵澳大利亚。据记载,早期到达“这类苦力是从中国农民的低下阶层中招来的;他们体力不佳,品质低劣”<sup>[3]</sup>,大部分来自广东农村。随着 1850—1851 年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更多的中国劳工被各种开发公司和劳务公司招往“新金山”(区别于稍早于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北美“旧金山”),抵澳华人数量最多时达到 42000 人,占非白人人口之首位。受部分来自欧洲的白人淘金者嫉恨华人的影响,最早发现金矿的维多利亚殖民区也最先通过了限制华人法案(每十吨船载量限载 1 名华人,并征收十磅人头税)。此时各地排华暴行不断发生(如 1857 年发生了巴克兰河大屠杀)。1877 年,从另一个殖民区昆士兰引发了全澳性的第二次排华浪潮。1880,各殖民区召开第一次区际会议,设立了一个有关“中国(人)问题”的议题,结果导致除西澳殖民区外的各区都通过了限制华人的移民法。这一情况和发生在世界其他“金山”(如北美)的情况如出一辙。例如,1882 年和 1885 年,美国、加拿大分别通过了排华法案。针对美国的案例,历史学

家史景迁评论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做不利于其他人民的事。”<sup>[4]</sup>同样的评价几乎可以一字不易地移用到澳大利亚的早期政治史上——1888年召开的全澳第二次殖民地区际会议秘密议决要完全禁止中国人(含属于“英国臣民”的华人)移民澳土。1896年,第三次殖民地区际会议上,再通过“有色人种限制规定”,除华人外,限制的对象扩展到其他所有有色人种,包括“亚洲、非洲、太平洋岛屿原居民”。可见移民特别是华人移民的命运,和澳大利亚土著的经验实有历史的关联。1899年,邻国新西兰追随澳大利亚也通过类似的排华法案。至此,大洋洲的主要国家都向以华人为代表的非西方移民关上了大门。可以说,随之成立于1901年的澳大利亚联邦及其制订的“白澳政策”,就是以排华、排亚为要旨的。在这一政策下,延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澳的原中国移民已锐减至约9000人,其中属于早前入澳的第一代移民仅残存5000人。他们大都艰难生活在一个“黄祸”意识盛行的社会的底层。

二战后,因澳大利亚推行一项援助东南亚的“科隆坡计划”,亚洲国家开始有小量留学生移民。随着“白澳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松动到60年代末的废除,特别是1973年非歧视性移民政策的颁行,亚洲和华人移民的规模化才逐渐成为国家的常态。这里有好几个高潮。一是七八十年代在联合国协调下,从越南、柬埔寨等印度支那战乱地区怒海逃生的难民被澳国大批接收;二是八九十年代担忧香港前途的香港移民;三是1993年底的一项特别决定,使大批海外留学生转变为定居者,约有5万名中国留学生及其亲属因此成为合法移民(这也是“淘金时代”之后最大一波华人移民潮)。这几次较大移民潮中,华人都是主体,而且尽管其各有不同的来源地、不同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但都发生在20世纪70-90年代澳大利亚积极面向亚洲的时期,因此绝非偶然。这些移民大大扩充了在澳的非西方族裔特别是华人社区,全面充实了华人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资源,也为这个国家进入21世纪之后选择把发展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的亚洲偏重,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国现在已成为澳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正是这一点的部分证明。

然而,澳大利亚历史上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移民问题的争议。甚至也就是在上述时期,亚洲移民的增减和待遇也成为“文化战争”的一大战场。最引人注目的几个事件是:1984年,杰弗里·布兰尼教授发表

反移民观点,激起全国性的辩论,亚洲移民首当其冲;1988年,史提芬·费兹杰拉尔德博士发表研究报告,认为澳大利亚接受、增加移民是必要的,但只能以遵守“澳大利亚惯例”为条件,并且移民不应都拥有澳大利亚公民权(实际上是主张非西方移民回复到历史上二等居民的地位);同一年,政治家约翰·霍华德提出了“一个国家”理论,发展了1984年的布兰尼教授的观点,即认为亚洲移民将改变澳大利亚国家认同(身份)并破坏国内人民团结,因为他们背景的文化传统与“澳大利亚文化传统”多有乖违,并且相对“坏”和低下;1996年,由霍华德领导的政治右翼联盟党团上台,在大幅扭转其前任总理保罗·基廷“脱英入亚”进程的同时,与民间兴起的汉森主义默契互动;1998,“一个国家党”成立,学者甘桑·黑格提出:基于自19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就是白人统治的历史事实,土著和别的“少数民族”参与和决定澳大利亚国家事务并无足够的法理依据……这些包含种族主义或准种族主义的思潮、运动沉渣泛起,也受到了批判和反击。如著名学者卡勒林·别特、温卡·奥门森和钟·斯特拉登等人于1998-1999年间著文强力批驳上述论述,认为它们无视不同背景移民对澳大利亚国家的历史贡献,无视这个国家本来就是移居者社会的特性,用虚拟的“西方白人认同”来坚持单一主流文化立场,以抵抗文化多样性。

### 三、“单一国家”还是多元(文化)国家

与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相关的文化战争的第三个问题——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褒贬取舍,因涉及到西方社会思想的普遍困境,牵连甚广,此处不便详述,此处仅为收结本文顺作交代。

事实上,在澳大利亚语境中,多元文化主义与上述两个问题是互相涵括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借鉴了加拿大政府首倡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其实施力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个长期实行白澳政策的社会,这一选择为整个国家的行政设置、人口背景、文化风貌和资源分配结构都带来了巨大变迁。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要求从宪政到社会服务都满足人人有权“表达和分享他们独特的文化遗产,包括语言和宗教”,不论其来源地的文化背景如何都“有权获得平等的对待和机会”,以“维持、发展和有效地运用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技能和才智”的指标<sup>[5]</sup>。这样,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就不仅一举包揽前述的土著历史和移民现状,而且面向更多的外

来影响和内部变迁,从意识形态到社会风气都为国家身份的新建构规划出一个远大的、开放性的前景,并为各种文化的共处、兼容和分享设置社会平台。然而,在多元文化主义实施多年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和民间保守势力开始质疑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和社会成就,其高潮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汉森主义”的崛起:一个名为波琳·汉森的国会议员,在一次国会演说中公开表达了对“真正的澳大利亚人”被“剥夺”的抗议,以此煽动一种“怨恨和仇视的政治学”<sup>[6]</sup>。它与其后在法国兴起的勒旁主义并列而为20世纪后期西方政坛两大种族主义——准种族主义现象,为世所瞩目,更在澳国引发政治地震。90年代后期执政的霍华德右翼政府,则承接了这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突破”并与之朝野互动,标举名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纲领(波琳·汉森本人也创建了“一个国家党”)。这种“一国论”,指的是要防制不同的文化集团把国家带向分化、分裂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主张几乎可以看作是亨廷顿有关国际政治“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预设了不同文化具有不可变易和难以交汇的根性、纯粹性,其间关系或应区隔(国际),或应同化(国内),土著和外来移民如若不符“国家标准”,则不应纵容。汉森主义、霍华德主义并非没有抓住多元文化主义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软肋,但他们的“一国论”却无法解决也无意解决这样的根本疑难:在一个本来就主要由移民组成国家里,怎样化解“盎格鲁体制”不证自明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上的“硬核”?正是这样的硬核始终梗阻、困扰着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解决进程。正如乌龙冈大学教授温卡·奥门森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谁才是“澳裔”?谁才是“我们”(“澳大利亚人”)?国家是谁的?在“一国”之内是否有些公民比其他公民更有资格来占有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身份的定义权?<sup>[6]</sup>

另一方面,已有国际学界的澳大利亚研究认为,即使经历了“数十年来密集的多元文化影响”之后,其“社会的核心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属于单一文化。”在多元文化百鸟朝凤的绚丽风光中,这个社会的真实图景,其实是“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环绕之下社会建制的单一文化核心”,即“盎格鲁体制”对社会资源的牢牢掌控<sup>[11]</sup>。从这样的意义上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本来就不成问题,问题只是在于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对社会基础越来越大的改变,保守的主导势力是否愿意出让按照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本应分享的国家资源——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意义上的资源。

从澳大利亚的案例,可知一国身份涉及到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利益及其动态调整的方案选择,它既与一国所处的世界格局有关(这种格局限定了可供其选择的范围),也受国内历史传统、社会势力和人口的族群文化背景结构的变化牵制,而有关意义的思想观念也在其间具有巨大作用。在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国家)“想象”理论可以获得必要的补充:现实格局并不排除想象的参与、介入,甚至它就是经由这种想象设计、创造出来的,但已经被创造的东西即有其现实性。新的“想象”固然可以对既有现实挑战、超越(比如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保罗·基廷式的亚洲身份“想象”等都一度占上风),但既有现实格局又是想象运作受制于其中的语境。不难理解,上述涉及澳大利亚国家身份规划的意义疑难与其国内、国际现实是高度混合交集的:澳大利亚在20世纪后期亚洲移民的涌入无疑改写了其内部的文化地图,加强了它和亚洲在贸易上和精神上的联系,并为一度冒升的“走向亚洲”、“融入亚洲”的自我想象提供了基础和动力,而其盎格鲁文化核心的征服历史及其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性,又使它不能不和国际性的西方主导势力保持关联与有机互动;澳大利亚历经多番“共和运动”和“脱英入亚”的热议,却至今没有摘去头上一顶“大不列颠属国”的帽子,这是新兴西方国家中的唯一例外。这已经无关任何实际利害,而主要与其部分国民历史想象的象征需要和平衡政治地理疏离感的“意义”沿习有关。所有这些都使澳大利亚在不同方向的巨大力量的撕扯之下,经历国家身份上的深重疑难。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发生怎样的演变(甚至出现奥巴马式的非主流族裔领导人),澳大利亚仍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被迫因自己特有的多样性去不断追问自己的身份。

澳大利亚案例提供了这样的启示,不仅第三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其“后殖民处境”,而且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通过西方势力移民建立的新国家——原属老帝国的殖民地后来转变为独立政治实体的西方国家,也有其“后殖民处境”。这两种后殖民问题当然具有很不相同的性质和特点,但这至少说明了,“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和同质的。

同时,澳大利亚案例也说明,对世界文化政治的版图,不宜总用“极化”的理解来简单处置,无论世界已经进入、即将进入或正在进入“单极”、“数极”或“多极”的时代,总存在广大和多样的中间地带。如果极的概念包含着能量和实力指标的话,那么,正是在

这些中间地带的复杂生态之间,孕育着权力关系变动的无限可能。既然世界结构此消彼长的变化不会终结,对各种中介、桥梁、复合、转换的因素的关注也就不会是多余的。这种关注还提示人们,一个国家(无论其是否为现实之极)的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他者的种种界线并不是绝对(比如对澳大利亚式的国家而言,有关移民的思想和制度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越界”因素,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这大有别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这样的界线当然也就需要动态的考察去穿越。

新时代出现了移民激增、文化杂交、族群涌动的形势,使越来越多的人类面临文化适应和身份重构,也把国家水平上的社会组合带到身份认同的挑战的前线。面对这样一幅“多种后殖民处境,多重身份问题”的错杂图景,澳大利亚国家身份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点。

注:

- ① 澳大利亚政治家。两人曾于20世纪90年代分别担任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总理和外交部长。
- ② Wenche Ommundsen, "In backlash country: Revisiting the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debate in the wake of Pauline Hanson" in Adi Wimmer, e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Maintaining a Monocultural Tradition in a Multicul-*

*tural Society*, Tübingen: Stauffenberg, 1999, 223-33, 中译为温卡·奥门森《多元文化写作、后现代批评与澳洲文学界的汉森主义》,钱超英译,钱超英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参考文献:

- [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69.
- [3] C·W·蔡.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移植和定居[M].悉尼:悉尼大学出版社,1975;中译参《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辑“大洋洲华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
- [4] (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中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大讲演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5] James Jupp. *Understanding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Canberra[M].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cation.1996.9.
- [6] Adam Jamrozik, with Cathy Boland & Robert Urquhart,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n*[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1.

【责任编辑:陈红】

## Australia: Immigrants, Multi-cultures and Identity Puzzle

QIAN Chao-y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 puzzle is embodied in its six-phase evolve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fferently defined modern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politics, as well as in its cultural-political practice regarding the three major issues of immigrants, aborigines and multi-culturalism. Australia's exploration of her own national identity is restricted by history, and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of her own cultural ideal. Its ambiguity and indeterminacy provide the country with a special adaptability in the world pattern, and work as a showcase to in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diverse postcolonial situations and multiple identity issues": to look into the global cultural pattern, we need to be flexible and dynamic, to weaken polarity and to promote "border-crossing" thinking.

**Key words:** Australia; immigrants; multi-culture; identity puzzle